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9月29日

理论研究

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韩　钢

20世纪的中国，如果说到变化，最深刻、最广泛、最举世瞩目的变化无疑是改革开放。1976年粉碎“四人帮”并实际终结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逐步拨乱反正：清理“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党政班子和调整人事，恢复和整顿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落实农村和农业政策，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平反“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前的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等等，所有这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举步维艰。

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正值改革大潮涌动，邓小平说：“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多少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1957年。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党从这时起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然而，不过一年，中共八大的这一决策就被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在这里拐弯，中国陷入了以主要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误区。即便是以工业化加速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也充满了“阶级斗争”色彩，“反右倾保守”“双反”“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运动，成为那场“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阶级斗争”手段。“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0年代，党和国家逐步调整政策，紧张的政治空气一度缓和。然而，调整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不同主张，群众为克服困难采取的包产到户等各种自救措施，再度引发分歧。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被认定为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抬头”。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尚未根本纠正，政治和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则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被断言都存在资产阶级和复辟企图，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观点占据主导，“阶级斗争”被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一万年也要讲”。有所缓和的国内形势再度紧张，一些提出调整农村政策、统战政策、对外政策的领导人受到指责，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遭到严厉批判，政策调整中的高层分歧演变为更为剧烈的冲突，终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化大革命”将“阶级斗争”推向了极致。晚年毛泽东对整个党和国家的政治形势严重误判，认定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形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而发动了这场所谓“政治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而且在理论上和政策问题上严重混淆了是非。它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和干部，打击和排斥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大混乱，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关严重瘫痪和半瘫痪，生产、工作和各项事业以及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干扰和影响。中共中央后来对此作出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痛定思痛，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反思历史，总结教训。从1957年到1976年，长达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多大提高，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更遭受了十年“文革”的内乱，深刻的教训在于长期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具深刻意义的转折。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解除了长期阻滞党和国家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思想桎梏，才消解了干部、群众对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问题上的种种困惑、疑虑甚至恐惧。思想的闸门打开后，社会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巨大成就。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以“三个转变”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三个转变”归纳到一起，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1990年代，年届九旬的邓小平以中国共产党老革命家的身份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他最后的政治嘱托，更是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应当是永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志。

党的思想史

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三个基本观点

□韩光宇

从1952年7月中共中央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到1989年11月，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几十年间，邓小平起起伏伏，历经多次波折。30多年的风雨，使他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情况，具有深切体会，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文章中的总结，至今让我们受益匪浅；他主导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也留下许多经验，对改善党的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一步提高科学、民主、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有三个。

1962年，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讲：“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这是他的第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分析此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

所谓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主要是指在党的七大、八大党章和“五四”宪法中的规定：党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由党员和人民群众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各级党委、人大及其常委会，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分别对党代会和人代会负责并接受他们的监督。这些规定，明确了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权力形成的方法，党员和人民行使权力的途径和原则，以及接受监督的渠道。充分贯彻体现了党员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亦即党和国家的性质。所以邓小平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就明确地说：“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第二个基本观点，即他对党和国家“文革”前贯彻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总体判断。邓小平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这段话，言简意赅，旗帜鲜明；有时间节点，有性质判断。一是肯定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贯彻民主集中制比较好；二是指出这一好传统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制度。没有严格，是说贯彻执行不认真不彻底；没有完善，是说制度本身还不健全。简言之，没有形成严格完善的制度，是他对贯彻民主集中制情况的一个总体判断。

第三个基本观点，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邓小平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教训极其深刻。“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这是他的结论性总结。

新时期论坛

走出“塔西佗陷阱”的路径选择

□肖　红

在实践中，影响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生态的基本框架分析出发，走出“塔西佗陷阱”（意指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的政治生态路径选择应从解放思想、创新制度、重塑文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等四个方面来实现。

打破制约公信力实现的政治生态思维定势

培育具有现代政治心理素质的政治生态主体是构建良好的现代政治生态制度、机制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政治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现代化转变，失败或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所以，走出“塔西佗陷阱”的政治路径选择首先应从解放思想，从转变思维方式和端正价值取向两个方面打破制约公信力实现的政治思维定势为逻辑起点。

转变思维方式。自觉地把主观世界的思维意识与现代政治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克服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增强思维的创造性、现代性、独立性、平等性、人本性、协商性、规则性和法治性。

首先，现代政治文明是权利政治，有别于传统的权力政治。权力政治下的政治生态主体即政治行为者和客体即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强制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政治权力主体通过威权、强制来落实政策、实现任务，它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和各项权利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转。而权利政治是以尊重民众主体地位为出发点，更加注重民众在各个方面权利的实现，比如公民的知情权、利益表达权、参政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利等。这就要求政治生态主体要走出传统的“威权”和“管制”思维意识，形成尊重政治生态客体，与其平等相处的新的政治思维模式。

其次，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协商政治，是基于平等观念下充分发挥民众主体意识，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利益分割问题通过广泛的谈判、协商，并在妥协、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基本共识和认同。因此，这就要求政治生态主体在执政思维方式上实现根本的转变，走出传统的唯我独尊、封闭决策的思维意识，增强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实现民主决策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化。特别是与群众利益切身相关的重大政策措施和重要改革方案，以及准备投资建造的重大项目等，在政府作出决策前一定要做好宣传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好协商和妥协让步，力争使做出的各项政策和决策符合民情民意，达到群众满意。

再次，现代政治是平面政治。桑玉成撰文指出，“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公民的‘多中心治道’，官民的协同治理等等，都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取向”。所以，政治生态主体要转变思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治生态体系中权力主体的唯一性正在被权力主体多元化所替代，公民、私营部门、社会组织等正和政府一起成为权力主体。

端正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要想端正价值取向，首要的是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给国人指明了要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从政治生态的视域来看，如果每一个政治生态的主客体，特别是政治生态主体都能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能够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能更加坚定政治信仰、确立人民利益和人民权利至上的价值观，就能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视角出发，把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等现代政治理念内化到政治实践之中，从而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构建官民共治共享的善治政治生态制度体系

现代民主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实现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的实现是建立官民互信的重要因素，因此，创新制度，构建官民共治共享的善治政治生态制度体系有利于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建立“官民共治”的善治政治生态格局。善治的目标是在政治生态体系内形成多元共同治理的现代政治治理格局，善治实现的途径是实现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利共赢的合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与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相比较，增加了“法治保障”，并且从“格局”跃升为“体制”，这表明我们党和政府更加注重政治内外生态各部分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因此，要想实现政治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必须建立“官民共治”的善治政治生态格局，这就要求党和政府逐步改变一元治理的行政模式，构建官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政府、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赢。

构建政治宽容机制，畅通政治体系中的民意表达渠道。在现代民主政治运行体系下，能否保障公民权利成为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公民拥有充分的政治表达权尤为重要。从政治生态系统的交互功能来看，政治宽容机制是现代政治的一种普适调节机制，它是保证公民合法有序参与政治，顺畅、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是落实公民权利、保证政治生态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建立政治宽容机制，畅通政治体系中的民意表达渠道，必须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落实好政务公开，使政府信息透明化，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同时，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政法机关以及群众团体的作用，重视和利用网络等新媒体资源，探索畅通群众反映意见和利益诉求的新渠道，切实关心群众的疾苦，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保障广大群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事有处办。

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文化环境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制约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态的基本架构，它通过一系列的准则或规则对政治系统内的个人进行约束。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决定着处于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人的政治价值取向。所以，要想走出“塔西佗陷阱”，实现政治生态的动态平衡发展，必须打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文化。

肃清政治生态中的官本位文化意识。从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上看官本位，其实质就是在“官为本、权为纲”的统领下不断追求做官和升官，人生价值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追求更高的官职和权力，为自己赢得更大的私利。官本位在政治实践中的表现就是导致了公权力的严重异化。从理论上讲，官员所拥有的权利是来自于人民，是具有公共性的，是每一个公民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官员，代替自己来行使权力，从而保障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在官本位意识支配下，这种公权力被异化了，权力成为这些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凭借权力，垄断和控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通过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使权力蜕变成危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异己力量，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弱化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所以，必须肃清政治生态中的官本位文化意识，构建规范的干部政绩评判体系和完善干部监督机制，扩大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权，加大“下评上、民评官”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确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破除官僚主义，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正如俞可平在其《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所说的：天大地大，民意最大。民意是什么？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肃清官本位意识流毒的影响，树立以社会和人民为本位的现代政治文明思想。

打造风清气正、“为民、务实、清廉”的官场生态。2014年6月30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这“四个要”是共产党员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的为政之道，也是打造风清气正昂扬奋进的政治生态环境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打造风清气正、“为民、务实、清廉”的官场生态，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清除干部任用上的不正之风，大力提拔那些一心为民，脚踏实地，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永葆共产党人浩然正气的好干部。“为民”是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务实”是党的作风的精髓，“清廉”是每一个领导干部为官的底线，我们不要仅仅把它作为群众路线教育的主题来落实，更要把它作为优良的政治生态文化内化于每一个从政人员的心，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

建设高效服务型政府

构建高效服务型政府是维护政治生态平衡，提升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根本路径。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模式演变的历史来看，我国政府经历了三个范畴，实现了从政治统治型到经济建设型再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比较三种政府范畴，它们在理论认识基础、政府行为模式和政府主导职能等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统治型政府是基于统治理论或者集权理论的认识基础，以政府统治为主导，强调政治权威的重要性，以政府机构和官员为本位，把人作为控制目标的政府行为模式。经济建设型政府是基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前提，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以政府和官员为本位，把经济事务作为管理对象，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政府行为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理论认识基础上实现了根本的转变，是以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以公共服务为政府的主导职能，以公共服务为目标，以社会和公民为本位，为社会和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产品。

从政治范畴的历史演变来看，目前我国正在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是变全能型管理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市场主体，政府主要做好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做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诸如文化、教育、住房、就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公共利益的实现。二是实现服务方式的转变，确立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治理理念，建立民主、法治、阳光、便民、微笑的政府，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同步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发展，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高效便民政府，以真诚为民服务获得公众持久的支持和信任。三是服务效果让人民满意，努力建成廉洁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监督和约束政府权力，防止权力的裂变和倾斜，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廉洁政府；完善政府信用体系，建立政府失信惩戒机制，逐步推行政府及政府人员的信用评级制度，培养广大干部诚实守信的良好习惯，加大诚信政府建设的力度；增强责任观念，明晰责任关系，健全责任制度，加大责任监督，建成权力和责任相统一、一切行为向人民负责的新型现代文明政府。